

卡布拉尔非洲 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郑祥福 周彤

内容提要 作为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创立了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并领导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实现了民族独立。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端于他在葡萄牙求学时期，在直面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酷后回归非洲，投身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去殖民化运动。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立足于非洲具体实际，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探赜殖民主义政治和文化机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新视角，为非洲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的空白，对全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卡布拉尔 非洲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作者简介 郑祥福，浙江师范大学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华 321000）；周彤，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金华 321000）。

1879 年几内亚比绍沦为葡属殖民地，从此陷入黑暗时期。殖民当局在几内亚比绍实行种族歧视与同化政策，对当地部落酋长实行间接统治，并强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服劳役。20 世纪 50 年代，当地知识分子联手佛得角激进分子进行反抗，组织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解放运动，成立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及代表人著作译介”（批准号：22&ZD019）的阶段成果。

党（PAIGC，简称“几佛独立党”），总书记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为动员非洲各民族参与斗争，卡布拉尔全面剖析几内亚比绍的社会状况，形成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几内亚比绍实现民族解放。

非洲民族意识觉醒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选择

1924年9月12日，卡布拉尔出生于几内亚比绍巴法塔地区，父母都是佛得角人。卡布拉尔的父亲朱维纳尔·卡布拉尔（Juvenal Cabral）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辩论家，曾在几内亚比绍许多地区工作过，对几内亚比绍社会和经济状况有着深刻认识，他引导卡布拉尔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对诗歌的热爱和对农业的兴趣。而从母亲多娜·伊瓦（Iva Evora）艰难的生活经历中，卡布拉尔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力。由于干旱和饥荒，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人民的生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而葡萄牙殖民者的到来使当地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早年的贫困经历使卡布拉尔意识到，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的贫穷与落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由殖民统治造成的。这是他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原因之一。

（一）政治意识的成熟：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吸收

1945年秋，21岁的卡布拉尔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农学院攻读为期5年的课程。学习期间，卡布拉尔接受了专业培训，为后来回国开展农业普查打下了坚实基础。闲暇之余，卡布拉尔活跃在非洲之家（Casa de Africa）、非洲研究中心（CAS）等各类政治社团活动中。葡萄牙的求学生活加深了卡布拉尔对殖民社会的认识，而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卡布拉尔的政治意识逐渐走向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影响，反萨拉查（Salazar）独裁统治的人们于1945年10月成立民主团结运动（MUD）。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等人创建了民主团结运动青年派（MUD - Juvenil），主要负责开展青年学生的政治活动。在青年派的影响下，一些非洲青年学生加入葡萄牙共产党（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简称“葡共”），安哥拉第一任总统阿戈斯蒂尼奥·内托（Agostinho Neto）和几内亚比绍政府的重要成员瓦斯科·卡布拉尔（Vasco Cabral）都是葡共成员。在葡共的帮助下，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等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但至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葡共提出“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观点，拒绝翻译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相关著作，也拒绝吸收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卡布拉尔曾谈到，在1960年访问中国之前，他从未读过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在当时的斯大林主义作品中，几乎没有

什么东西能够激发卡布拉尔的灵感，只为其介绍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此外，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受制于当时萨拉查政府的庞大势力，葡萄牙反对派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需要指出的是，与法国共产党一样，葡共并没有质疑葡萄牙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根据葡共的观点，殖民地国家也应像苏联一样组成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其最终目的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实现殖民地独立。卡布拉尔在葡萄牙接触并了解到欧洲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并提出要发展适合非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把更多注意力转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本身。

（二）身份意识的转变：非洲民族意识觉醒

葡萄牙的求学经历使卡布拉尔意识到自己是非洲人，非洲是自己的家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与在法国和英国的非洲留学生情况类似。马里奥·平托·德·安德拉德（Mario Pinto de Andrade）后来写道：“（再非洲化）是意识异化的第一次表现……有必要否定那些被殖民、被同化的人……我们觉得有必要净化自己，净化我们的大脑，以便把我们从殖民教育强加的文化同化中解放出来。”^① 在任何地方，这种“非洲身份”的自我认同都是一种文化声明。在佛得角、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受克拉里达德运动（Claridade Movement）^② 的影响，文化复兴已经开始。在里斯本，部分学生通过《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杂志了解由法国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黑人性运动”（Negritude），他们认为黑人的非洲遗产是对抗殖民统治和文化霸权最好的工具。

1945—1951 年是卡布拉尔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1945 年，非洲著名政治家、被誉为塞内加尔国父的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发表《影之歌》，揭露了法国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实质。受其影响，1949 年卡布拉尔创作了一首诗歌《罗莎》。在这首诗中，卡布拉尔宣称自己是“新非洲人”，标志着其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确定。正如萨特在《黑色孤儿》中阐述的那样，“由于异化是同化的结果，因此被殖民者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第一步是对殖民主义文化大规

① Mario Pinto de Andrade, *Amílcar Cabral Reafirmação Dos Espíritos*, Bissau: Nô Pintcha, 1976, pp. 8 - 9.

② 克拉里达德运动，1936—1966 年发生在佛得角的文化复兴运动。克拉里达德最初是一本文学杂志，于 1936 年由曼努埃尔·洛佩斯（Manuel Lopes）和巴尔塔萨·洛佩斯·达席尔瓦（Baltasar Lopes da Silva）在佛得角圣维森特岛的明德洛市出版。为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寻求身份认同，作家们围绕干旱、饥荒、移民等创作了一系列诗歌作品在该杂志上发表，以反映葡萄牙殖民统治下人民的贫困生活。克拉里达德运动中涌现的文学作品涵盖了佛得角文学、黑人文化和民族认同，是佛得角社会文化和政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模排斥。”^① 卡布拉尔后来也提出类似观点，强调必须摧毁殖民文化，并寻求非洲知识分子的支持。作为“文化同化的异化者”，卡布拉尔利用殖民主义者贬低非洲文明时所使用的话语，挑战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1949年起，卡布拉尔在里斯本推动实施“再非洲化”（Re - Africanization）计划。他认为，“获取有关非洲的知识是未来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的关键。”^② 1951年，卡布拉尔和同事们建立了非洲教育中心（CEA）。在这里，卡布拉尔讨论了非洲农业、人文、自然地理、语言与非洲精神，萌生了“抵制同化政策最终需要借助政治手段”的想法，决心回到非洲开展民族解放运动。

（三）落地非洲革命实践：投身去殖民化运动

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走向多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逐步扩大的利好局势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52年3月，卡布拉尔以优异成绩从里斯本农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后，他在离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不远的几内亚省农业和林业服务部担任二级农学家，并对几内亚比绍的农业生产展开考察，这次考察使他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深入了解。在农业考察期间，卡布拉尔与几内亚比绍及佛得角的公务员、企业家、城市工人和农民进行了政治接触。起初，许多人完全拒绝去殖民化的观点，但在卡布拉尔通俗易懂的讲解劝说下逐渐被说服，斗争与反抗思想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为进一步提高几内亚比绍人民的反殖意识，1954年卡布拉尔成立了一个体育、娱乐和文化俱乐部，成员们可以围绕非洲历史、文化和斗争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开展各种讨论。但到后期，俱乐部被葡萄牙秘密警察暗中渗透，活动屡遭破坏。1955年卡布拉尔被葡萄牙殖民政府永久驱逐出境，他也因此看清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平过渡”的想法开始动摇。

1956年9月，卡布拉尔与其胞弟路易斯·卡布拉尔（Luis Cabral）等6人创建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他本人任党中央总书记。成立初期，几佛独立党的党员寥寥无几，主要活动也多集中于几内亚比绍城市地区。相对于非洲其他地区激进的反殖民斗争，早期的几佛独立党一直主张以和平手段取得独立。然而，这一主张在皮德吉吉蒂大屠杀后发生了变化。1959年8月，比绍市皮德吉吉蒂港工人因工资问题开展罢工运动，遭到葡萄牙秘密警察的野蛮镇压，50多人被杀害，100余人被打伤。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同年9月卡布拉尔与几佛

① Jean Paul Sartre, *Orphee Noire*, Présence Africaine, 1949, pp. 9 - 14.

② Patrick Chabal, *Amilcar Cabral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and Peoples War*, Trento: Africa World Press, 2003, p. 45.

独立党的骨干成员在比绍举行秘密会议，一致认为非暴力运动并不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任何改变，只有武装斗争才是实现独立的唯一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几佛独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移至农村，为抵抗活动积蓄力量。通过近 10 年的武装斗争，几内亚比绍绝大部分地区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解放区。

随着革命斗争深入发展，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深化。首先，马克思主义为卡布拉尔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使得他能够全面彻底地分析几内亚比绍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作为一名农学家，农业学习特别是农业普查的相关经历使卡布拉尔更加注重社会现实和实践经验。最后，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罪恶本质的认知，使卡布拉尔坚定了通过暴力手段获得革命胜利的信念。至 1959 年，卡布拉尔已经清楚地知晓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国家独立，而革命斗争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卡布拉尔为这场民族解放运动所作出的数年的理论与实践准备，使得几内亚比绍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少数几个由“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发起的革命之一，在不到 10 年时间里解放了几内亚比绍近 3/4 的农村地区。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

非洲革命的具体实践使卡布拉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19 世纪欧洲产生的理论，并不能原封不动地转变为非洲革命的指导思想。他曾在《理论武器》中强调：“无论我们的敌人有多么相同，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出口的商品，……它们是由每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决定的，并通过克服或正确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内部矛盾而取得成功。”^①卡布拉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发展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的实践中逐渐成形的，其下沉至非洲历史与社会的具体现实，是全面的、科学的、具有牢固群众基础的非洲马克思主义。

（一）以社会历史观驳斥“非洲无历史论”

长期以来，非洲历史研究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优越主义的气息。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非洲并没有历史，他们将黑格尔的“非洲无历史论”奉为圭臬，给非洲贴上野蛮、落后、未开化的标签。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以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以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为首的一批非裔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呼吁采纳一种“植根于非洲文化传统的非洲中

^① Amílcar Cabral, *The Weapon of Theory*,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First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 of the Peoples of Asia, 1966, p. 4.

心意识”(Africa-centered consciousness)^①，驳斥“非洲无历史论”的荒谬观点，重申非洲历史和黑人文化发展的独立地位。

在非洲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为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和经济剥削抗衡，卡布拉尔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的观点，对几内亚比绍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阶级分析。他认为非洲历史是由非洲人民创造的集体记忆，是非洲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的综合。在阶级斗争之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形式保障了非洲历史以及黑人文化的存在。而由殖民主义带来的殖民文化和意识形态，创造了以种族划分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阻碍了非洲历史发展，压制了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文化创造。因此，“一个民族的解放就是恢复这个民族的历史人格。”^②卡布拉尔强调，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重新掌权于历史的生产——民族解放，才能够确保社会的发展。在全国性的农业普查中，卡布拉尔看到了非洲殖民地阶级状况的不同之处：在前殖民时期，非洲的部分民族（如巴兰特人）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到来，这些地区、民族无分层、无阶级的平衡被打破，他们相继离开了自身的历史，进入由殖民主义书写的历史。这一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被非洲国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取代，阶级、阶级斗争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出现：非洲全体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压迫对象，非洲国家的历史开始演变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斗争的历史。对于殖民地而言，国家内部所有被压迫阶级都是“历史的代理人”^③，支配历史的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殖民宗主国。

在几内亚比绍，受制于殖民主义统治，卡布拉尔无法找到一个类似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工人阶级革命的样本，也无法找到类似毛泽东思想中农民阶级革命的范式。为此，卡布拉尔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创造了一套适用于殖民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特殊性的非洲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他认为，必须分析几内亚比绍每个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依赖殖民政权”^④，他们对民族解放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作用，以及民族独立后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在几内亚比绍，最依赖殖民政权的是那些由传统部落酋长、白人工人、城市商人和一些非洲小资产阶级官

① 冯定雄、赵潇斐：《“非洲中心主义”与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西亚非洲》2022年第3期，第112页。

② Amilcar Cabral, *The Weapon of Theory*, pp. 18-19.

③ Amilcar Cabral, “Brief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Guinea,” in *Revolution in Guinea: Selected Text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 54.

④ Amilcar Cabral, *Revolution in Guinea: Selected Texts*, p. 59.

员组成的上层资产阶级，对于他们而言，推翻殖民统治就等于推翻自己。而对于那些持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农民而言，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几乎为零，他们是“保存非洲文化传统以抵抗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①。当然，卡布拉尔也指出，这些农民虽然创造了大量国家财富，是强大的社会物质力量，但其与中国农民的条件不同，他们没有反抗的历史，不容易动员，因此并不能寻求农民阶级——一个不存在“阶级意识”的群体，作为革命先锋队伍的领导。那些非洲本土的小资产阶级脱胎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异化，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阶级：完全由非洲土著组成，却是最西式的非洲人；是一个懂得如何操纵国家机器并为殖民主义服务的阶级，但是从未得到殖民主义者的完全信任；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却无法对殖民文化全盘认同。因此，卡布拉尔只能把赌注押在这些小资产阶级身上，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从殖民主义者身上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发展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并作为非洲人民的政治领袖带领他们逐步恢复自身的历史。当然，卡布拉尔并不认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自动形成和发展的，而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阶级特权及其寻求经济利益的个人主义倾向，都使得革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困难重重。因此，卡布拉尔指出，小资产阶级必须依托个人意志，在“回归本源”的号召下，在民族解放的实践中完成思想解殖，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逐步带领人民开展有组织的斗争，进而实现民族解放，恢复非洲历史。

卡布拉尔对于几内亚比绍阶级状况的深入剖析，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生动写照。他在深刻了解本国阶级、民族问题后，分析了发动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力量对于民族解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洲实际的结合对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乃至整个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以生产力决定论剖析非洲经济发展状况

几内亚比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 世纪末与安哥拉、莫桑比克一同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但与安哥拉、莫桑比克不同，殖民主义到来后，并没有在几内亚比绍推行种植园经济，而是保留了小土地所有制，强迫农民种植花生、大米、棕榈仁和橡胶等出口经济作物。葡萄牙对几内亚比绍的国民经济实行控制，目的是通过殖民主义的贸易网络将其农业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他们人为地设定极低的价格收购农民种植的产品，同时将进口商品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给非洲人民，长期的统治与剥削给非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53 年农业普查报告表

^① Amílcar Cabral, *Revolution in Guinea: Selected Texts*, p. 61.

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并没有为几内亚比绍农业生产引入先进技术，也没有改变当地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他们通过强迫农民种植既定的农产品、出口黑人奴隶和暴力掠夺来完全控制非洲人民的正常生活。为了获取更大利润，殖民当局还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相关资料显示，繁重且不合理的税款侵吞了土著家庭1/4的年收入。^① 面对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悲惨境遇，卡布拉尔意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他将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了社会生产实践中人与资本“拜物教式”的颠倒关系，认为非洲大陆殖民与压迫问题的根源就是社会运行遵照资本逻辑。在《理论武器》一文中，卡布拉尔进一步指出：“新殖民主义通过让社会动力觉醒（本土社会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历史进程正在回归正常的错觉，这种错觉将因本土因素组成的政治权力（民族国家）的存在而强化。”^② 在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下，生产资料、劳动力包括整个社会都是资本发展的客体性存在，国家作为统治的工具，是维持殖民资本的政治手段。因此，只有完全消除殖民主义对民族生产力的控制，才能使非洲大陆及非洲民族回归自身历史正常发展的进程。

为抵抗葡萄牙的经济殖民，卡布拉尔创立了独特的经济抵抗策略，旨在结束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他看来，经济独立的主要目标是“破坏”与“建设”^③，即在破坏葡萄牙殖民经济体系的同时，进行本国自身的经济建设。在敌占区，几佛独立党主张通过一切手段破坏殖民当局的生产，摧毁殖民当局的经济；而在解放区，卡布拉尔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国家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小型私营企业共同发展为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作为一名农学家，卡布拉尔清楚地意识到，像几内亚比绍这样的农业国，国家前途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他强调，农业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发展好农业，才能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随着对几内亚比绍领土的进一步控制，1964年2月，几佛独立党第一次党代会——卡萨卡大会在南部解放区召开。卡布拉尔就重建解放区经济发布了指导方针。在农业生产方面，卡布拉尔主张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改善种植方法等手段增加稻米产量。此外，为加强个体生产者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交流，卡布拉尔还提出为香蕉、菠萝等经济作物建立集体种植区，并以此为基础在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商品交换方面，为抵制殖民公司的盘剥，解放区成立了“人民商店”，作为几内亚比绍贸易流通体系的重要环节。人民商店的一切贸易活动都由几佛独立党高层直接领导，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公平

① 兵军等编译：《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101页。

② Amílcar Cabral, *The Weapon of Theory*, p. 16.

③ Amílcar Cabral, *Resistance and Decolonization*,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p. 92.

合理的价格重新分配,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剩余产品也通过人民商店出口,兑换成进口商品。至 1968 年,解放区的人民商店已达 15 家。^① 人民商店的创建和发展,打破了殖民公司作为几内亚比绍唯一商品供应商的局面,正常合理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得以建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获得发展。

卡布拉尔立足几内亚比绍及非洲实际,剖析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对非洲剥削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对几内亚比绍未来经济发展作出规划。在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号召下,解放区经济取得显著发展。尽管战争时有发生,几佛独立党还是设法保障人民的生产和分配,这为之后实现民族独立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 以社会革命论助推非洲文化解放

卡布拉尔在其对殖民主义的分析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他对非洲文化的强调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卡布拉尔指出,殖民主义中断了非洲民族的历史,这“有利于其他民族(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②。因此,殖民主义不仅剥夺了非洲的农产品,更剥夺了非洲的历史和文化。卡布拉尔对殖民主义的剖析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又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他将殖民主义界定为实施文化霸权的复杂范式,其目的是“使殖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与被殖民者的文化个性相协调”^③。殖民者有意改变非洲传统文化,使之更加适配于殖民主义经济、政治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殖民者试图通过实行文化压迫以摧毁非洲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并用更狭隘的殖民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取而代之。他们摧毁了非洲人民对其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进一步合理化殖民主义及其历史。殖民主义所表现出建设性和破坏性、进步性和倒退性的矛盾,正如卡布拉尔认识到的那样,“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国家,缩小了世界的规模,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它带来了偏见、歧视和罪行,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其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④

殖民主义帮助西方文明确立了在现代科学、世界市场和先进生产力方面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得部分暂时被压制的非洲文化表现出特殊化倾向,这一特殊化倾

① Patrick Chabal, “National Liberation in Portuguese Guinea 1956–1974,” *African Affairs*, Vol. 80, No. 318, 1981, p. 95.

② Amílcar Cabral, *Revolution in Guinea: Selected Texts*, p. 76.

③ Amílcar Cabral,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of Amílcar Cabr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 40.

④ Amílcar Cabral,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of Amílcar Cabral*, p. 58.

向是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采取的文化抵抗。卡布拉尔认为，非洲人民最初的抵抗是因土著统治阶级的背叛，被殖民主义粉碎的。然而，在非洲人民的努力下，非洲文化在风暴中幸存下来，在部落、原始森林居民和殖民主义受害者几代人的精神家园中避难。由于这种非洲文化深藏发展的潜力，所以拥有对抗殖民主义的能力。卡布拉尔指出，必须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文化解放运动，对非洲文化的历史创造和文化建设能力进行科学化、合理化的重建，以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文化霸权，这就是“文化抵抗”策略。文化是民族解放的理论武器，而民族解放是人民文化有组织的政治表达。民族解放的成功与否，在于该斗争是否拥有一个普遍的、明确的、大众的文化价值。为此，卡布拉尔进一步强调：“无论该国的文化水平如何，解放运动在文化层面必须以流行文化为基础。”^① 在“文化抵抗”的框架下，民族解放首先是一场为保存人民文化价值观，并使各民族、各阶层的文化认同在国家内部协调发展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完成，不能仅仅只寄托于学术纷争，必须落地于具体的革命实践。正如卡布拉尔所言，“回归本源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只有将其根植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过程中，才具有实际意义。

正如利奥波德·桑戈尔一样，卡布拉尔坚定地将“回归本源”和“重新非洲化”作为这场文化斗争的方法。但在经历了殖民统治之后，他指出复兴非洲文化必须意识到其在“普遍文明的框架”中的地位，即“为了人类的共同遗产而征服一小部分人类”。^② 卡布拉尔的“文化抵抗”策略是对桑戈尔等人提出的“黑人性运动”的深化与超越，是对几内亚比绍历史现实的独特回应。他将抽象的精神感召落地于革命的具体实践，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开创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新视角

几佛独立党是西非第一个号召并准备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的民族主义政党，^③ 尚处于新生阶段，没有相关经验借鉴，也未取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党的自身建设较为薄弱，而这种情况在卡萨卡大会后得到改善。

首先，在指导方针方面，与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类似，卡布拉尔强调几佛独立党坚持四大基本方针：革命民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

① Ami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ilcar Cabr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 146.

② Amilcar Cabral,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of Amilcar Cabral*, p. 51.

③ [美] 理查德·吉布逊：《非洲解放运动：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页。

评。在这四大方针的指导下，卡布拉尔提出对中央各部门进行改革并建立地方基层领导机构，以适应斗争的新要求。在解放区，权力转移到地方基层领导机构，并设立特别行政委员会，管理解放区内经济、行政、司法、教育和卫生等相关问题。^① 此外，为避免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卡布拉尔强调，方针的贯彻与实施必须密切结合几内亚比绍的实际情况及革命实践。基于此，战争期间几佛独立党曾先后多次对解放区内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例如，为解决农村干部因自治权过大而出现职权滥用的问题，几佛独立党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基层领导机构的控制，以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

其次，在政治动员方面，卡布拉尔反复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性。1960 年初，许多党的干部在科纳克里经过理想信念和政治培训后，被送往农村地区开展政治动员，为之后发起武装斗争做准备。此外，为揭露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罪恶行径，在解放区的红树林中，卡布拉尔和几佛独立党的干部多次与普通民众举行座谈会，以动员和扩大人民解放统一战线。1964 年 2 月，卡布拉尔提出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力量（FARP）并强调：“（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最根本的力量是我们的人民，是国家通过他们的儿女作为武装分子、领导人、战斗人员、民兵等来发动我们的斗争。”^② 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游击队、人民军和民兵。战争开始后，人民军与民兵定期在解放区开展训练，并选拔部分军官前往苏联、古巴和中国进行军事培训。卡布拉尔一直坚持将武装斗争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斗争经历基础上，认为“武装斗争不是军国主义的，军事目标总是次于政治目标”^③。除此之外，卡布拉尔还积极寻求外部力量帮助，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1966 年，在非洲解放支持委员会（ALSC）、苏联（以及华约盟国）、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下，几佛独立党对武器装备进行扩充和升级，种类繁多的小武器、轻武器被用于对抗殖民军队，为武装斗争的胜利做足了弹药补给。

最后，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卡布拉尔认为与其他殖民地一样，要改变几内亚比绍相对不发达的文化和状况需要建立一个以教育为基本任务的政党。也就是说，在殖民主义的文化压迫下，几佛独立党必须集中精力开展文化重建和复兴，“不仅要在农村和城镇创造一种新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一批充分了解国家、非洲大陆和国际权利和责任的人”^④。1963—1972 年，卡布拉尔提出全民教育计划，目的是在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人民中培养反殖意识，“在没有暴力的情

① Amí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ílcar Cabral*, p. 178.

② Amí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ílcar Cabral*, p. 76.

③ Firoze Manji and Bill Fletcher Jr., *Claim No Easy Victories: The Legacy of Amílcar Cabral*, Council for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 2013, p. 55.

④ Amílcar Cabral, *The Weapon of Theory*, p. 1.

况下改变落后习俗，改善人民信仰和传统的消极方面……与所有不利于人民团结的特殊主义（分裂主义），所有部落主义、种族或宗教歧视作斗争”^①。在卡布拉尔看来，几佛独立党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党；相反，作为人民文化的代表者和捍卫者，该党肩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完成集体意识启蒙的历史任务。卡布拉尔的这一观点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类似，在葛兰西看来，党是“现代君主”，“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萌芽”。^②由此，党必须在文化上觉醒，将党内先进知识分子的见解传授给人民群众，以发展一种集体意志。葛兰西指出，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参与政治生活，任何形式的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都不可能形成。显然，人民集体意志的产生仍然需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而在殖民主义条件下，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党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就意味着为达到现代文明最高和无所不包的形式的人们的、民族的集体意志的往后发展，奠定基础。”^③正如葛兰西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所坚持的那样，一项历史行动只能由“集体的人”来完成。对于支持“唯一能够保存、建设和创造历史的社会部门”的人民群众来说，^④党提供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国家机器和文化教育模式，在这一基础上，许多分散的、异质的意志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被团结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在殖民统治下不存在的民族政治象征和民族政治语言，这种新生的民族文化同时也确保了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发展的权利。几佛独立党的教育计划推动了殖民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民族独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文化基础。

正如葛兰西思想之于欧洲，卡布拉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家，卡布拉尔独特贡献来自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他拒绝寻求简单的政治独立，其对经济独立、政治统一和文化复兴等各个方面的关注，为非洲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有力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的空白。

卡布拉尔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非洲最深刻、最具革命性的理论经验，是

① Ami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ilcar Cabral*, pp. 242 – 244.

②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③ 同上，第105页。

④ Amilcar Cabral, *Return to the Source: Selected Speeches of Amilcar Cabral*, p. 61.

非洲民族主义躁动时期的反殖民运动的独特尝试。从本质上而言，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非苏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为非洲各国发展指明了不同于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非洲政党建设提供了参考。几佛独立党关于国家建设、革命运动发展的规划实际上是基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国家的建立。这意味着其必须在尊重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多民族性质的基础上，超越种族身份，而不是完全用民族身份取而代之。在过去 40 年的时间里，这项任务一直是非洲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是许多非洲国家倒退和痛苦的根源。

革命斗争时期，卡布拉尔始终强调几佛独立党的先锋性。在 1969 年对党内同志发表的 9 次讲话中，他选择将“团结和斗争”作为党的座右铭，辩证地定义了统一的概念，要求同志们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卡布拉尔坚持认为：“无论人民内部现有的差异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一个整体，才能实现既定目标。”^① 在与战斗人员的讨论中，卡布拉尔敦促几佛独立党的干部，要对人民的愿望保持深刻了解。在他看来，只有团结人民的力量，才能战胜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

任何一个阶级或团体企图垄断国家权力，都会破坏国家政权的稳定。卡布拉尔指出，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非洲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速度通常比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要快，加之多数非洲国家缺乏积累资本的途径，那些具有革命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这一阶级与农民和无产阶级一起，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实现民族独立。而在民族独立后，由于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及民族国家建构尚未成熟的现实，许多政党都以部族这一非洲原始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为执政基础来维持自身统治。这导致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对国家的管控水平低下，是一个披着“先锋党”外衣的“大众党”。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会背叛民族解放的目标，继续剥削人民，走上殖民主义的老路。因此，对卡布拉尔而言，党的领导者的政治意识要比其阶级出身、其所进行的具体改革或国家经济结构的特征重要得多。卡布拉尔认为部族主义不是人民的发明，相反它符合机会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努力获得政治职位，并以此作为积累财富和剥削人民的工具。卡布拉尔还认为，这些机会主义者是人民的敌人，“是我们土地上的敌人，他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进步，而只是希望自己进步。”^② 因此，他时刻教育党的干部要不断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许多国家已经因为统治者害怕失去权力而走向毁灭。

① Ami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ilcar Cabral*, pp. 28 – 29.

② Ami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ilcar Cabral*, p. 75.

经历 30 年的政治实践，尽管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效果难以令人满意，但不可否认，非洲政党和政党治理体系总体上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这是非洲领导人在多党制框架下自主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对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无论采用何种政党体制，执政党都应该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身执政基础，将政党执政追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统一。此外，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有效的中央权威是实现政治绩效的关键。非洲政党可以从卡布拉尔的政党建设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汲取经验，不断提升治国理政水平。

其次，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非洲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基于对国家农业状况的深刻理解，卡布拉尔知道，大多数人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样获得土地，而是改变殖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殖民政府坚持不以农业作为几内亚比绍经济发展的重心，而是通过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用以出口，从中获得巨大利润，这是阻碍和限制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卡布拉尔来说，帝国主义没有履行其历史使命。它没有发展生产力，只是逐渐走向“资产阶级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加剧，以及阶级分化的加剧”^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式微，许多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为了欺骗大众、获取资本，掌权的精英阶级提出了国有化之类的伪计划，这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以及对公共资金的不合理占用。在新自由主义的保护伞下，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表现出强烈的寄生倾向，成为殖民主义的继承人，他们为了商业利益仍在将非洲人民的劳动产品运往欧洲大都市，这种资本转移是以利润、偿债或股东收益等为形式。与此同时，农民、工人的收入仍然和以前一样杯水车薪，剥削农民、工人阶级是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的特点。许多工人阶级用以维持生计的必需品被附以高额的税率，以补充国家预算，支持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奢靡的生活。在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国家，种族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在独立国家，即使国家政权掌握在非洲人手中，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显然没有阻止非洲民族内部相互剥削，因为其所提倡的“种族团结”并不排除种族内部的剥削。此外，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倾向。

卡布拉尔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非洲，要获得发展，必须实现经济独立，必须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当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驻足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确实对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无论是采用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非洲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都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经济依附，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发

① Amílcar Cabral, *Unity and Struggl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Amílcar Cabral*, p. 127.

展水平。作为非洲国家，应利用好外来援助，从实际出发制订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经济计划，努力完善经济结构，改善各个地区、各大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并积极引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外部力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最后，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泛非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现代非洲大陆核心意识形态是泛非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在种族层面上运作的意识形态，泛非主义强调非洲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个性，追求非洲国家的团结，在政治上不主张以阶级区分人民，反对将各种族群冲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处理为阶级矛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泛非主义是非洲大陆最成功的统一者。发展至今，许多黑人学者深感自豪，认为泛非主义对黑人意识形态的丰富与发展具有独特贡献。但从时间上而言，泛非主义几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诞生的“泛主义”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或原创的东西。虽然泛非主义指引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它并没有克服部族主义的弊病，成为一种指导非洲社会发展的理论纲领，因而未能成为促进非洲发展的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不同国家存在利益分歧，泛非主义的领导者们未能进一步巩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果实，无法实现彼此之间的团结，最终导致“非洲合众国”计划的破产。

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告诉我们，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革命并不是简单的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依靠对不同类型的革命性力量动员来完成的。在 1966 年发表的《理论武器》中，卡布拉尔阐述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在我们目前的历史形势下——摧毁使用一切手段企图永久统治我们的帝国主义，以及巩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独立国家只有两条可能的道路：回归帝国主义统治（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走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作为革命性的意识形态，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泛非主义适合在殖民形势下，通过团结不同的社会阶级，从而实现政治和民族革命；而社会主义则更适合在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后进行社会和经济革命。卡布拉尔深知，泛非主义最大的弊病在于忽视了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在几内亚比绍民族解放进程中，他引入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泛非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以证明其有能力在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卡布拉尔认为在泛非主义的薄弱领域，社会主义都颇具价值。由此，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从泛非主义的结束——国家独立后开始，这不是为了颠覆泛非主义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而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

^① Amílcar Cabral, *The Weapon of Theory*, p. 23.

结 语

卡布拉尔延续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实践导向的文化哲学”。^①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而是立足于几内亚比绍及整个非洲社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实际，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革命理论。他鼓励人民认真对待自然与社会科学，以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促进非洲大陆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原始的、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相反，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非洲革命实践，是一种与非洲实际相适配的科学社会主义。古巴革命的卓越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曾对卡布拉尔的一生做出评价，称其为“非洲最清醒、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②。可以说，卡布拉尔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富含真理，特色鲜明，不仅为那些受困于殖民压迫的穷苦人民提供了追寻永恒正义的方向，同时对于当今全球的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泛非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陈雅慧）

① 宋志明：《文化与革命何以交会？——卡布拉尔论非洲文化》，《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26页。

② Fidel Castro, Speech at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 in Havana's Chaplin Theater, 1966.

forces, but also the initiative of Nigerien government to ease conflicts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aspects, in order to gradually achiev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value – added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m in Tillabéri, which is helpful for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security governance in Niger and even the Sahel.

Keywords: Sahel; Niger; reg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value – added theory

Authors: Qi Zhao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Xu Jiabin, Post – 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An Analysis of Cabral’s African Marxist Thought

Zheng Xiangfu and Zhou To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anti –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 Amilcar Cabral founded the African Independence Party for Guinea and Cape Verde and led Guinea – Bissau and Cape Verde to independence. Taking Marxism as a practical philosophy, Cabral analyze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xplore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of colonialism from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Africa, providing a set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s for Africa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Cabral’s African Marxism thought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fills the gap of Marxist practice in “marginal countries”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ause of human liberation and progress.

Keywords: Amilcar Cabral; African Marx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PAIGC

Authors: Zheng Xiangfu,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the African Marxism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Zhou Tong, Post – 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0)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Al Jazeera in Africa: Historical Evolu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on China

Meng Lanjuan and Mao Jingyi

Abstract: As China and Africa work together to usher in a new era of win – 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 – depth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on certain issues, which can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biased and deliberately misleading reports by Western media on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nd